

地方党史資料

名称:

关于辽州有要一四二

辽五十三(号同)

类别:

作者:

3-19 (群经互复)

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

資料目錄

总 号	分 类 号	編 号	性 质	資 料 名 称	年 代	作 者	資 料 来 源	份 数	永 久	长 期	备 考
		1		一九二五~~ 一九二六年中 共沈阳党組織 活动情况。	1925.	吳生白	省編委	4			
		2		一九二五~~ 一九二六年党 組織在沈阳的 建立和初期活 动情况。	"	"	沈阳編委	"			
		3		党在沈阳的地 下活动情况。	"	郭尊三	"	"			
		4		一九二五年党 在沈阳市的活 动情况。	"	修玉华	"	"			
		5		一九二五~~ 一九三〇年党 在沈阳等地区 的活动情况。	"	王純一	"	"			
		6		一九二四~~ 一九三〇年中 国共产党在沈 阳的活动情况。	1924.	于 卓	"	"			
		7		一九二五~~ 一九二七年党 在沈阳的活动 情况。	1925.	苏子元	"	"			

8	关于一九二七 年前滿洲党的 組織和活动情 况。	1927.	苏子元	黑龙江 編委	4			
9	馬列主义在知 識分子中传播 情况。	1925.	"	省編委	"			
10	有关党在东北 的初期(一九 二三~一九 二八年)活动	1923.	"	"	"			
11	一九二五~~ 一九二七年党 在沈阳市和医 专支部的活动 情况。	1925.	白希清	沈阳編委	"			
12	一九二五~~ 一九二九年党 在沈阳活动情 况。	"	何松亭	省編委	"			
13	一九二五~~ 一九三一年沈 阳党組織的活 动情况。	"	张光奇	"	"			
14	一九二五~~ 一九三一年党 在沈阳的活动 情况。	"	"	沈阳編委	"			

15	一九二五～～一九二七年沈阳党组织及活动情况。	1925.	楊幸坚	省編委	4			
16	东北地下党情况。	"	高伯玉	"	7			
17	党在东北的一些活动情况。	1927.	陈 涛	沈阳編委	4			
18	党组织在沈阳的建立和初期活动情况。	1926.	周春暉	"	"			
19	我在大连活动的一些情况。	1927.	楊志云	"	"			
20	一九二五～～一九二七年党在沈阳地区的地下活动情况。	1925.	李維周	省編委	"			
21	大连地下党及有关情况。	1926.	邓 洁	"	"			
22	一九二六～～一九二七年党在旅大地区的活动情况。	"	"	"	"			
23	一九二七～～一九二八年党在大连的组织及活动情况。	1927.	紀幼柏	"	"			

24	一九二六年党在哈尔滨的活动情况。	1926·	紀幼柏	黑龙江編委	4			
25	一九二六～一九二八年东北党的地下組織情况。	"	杜省物	旅大編委	"			
26	一九二六～一九二八年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亲笔材料。	"	"	省編委	"			
27	一九二六～一九二八年初在东北的活动情况。	"	"	"	"			
28	一九二六年在长春、哈尔滨作党的地下工作情况。	"	"	吉林編委	"			
29	关于北满党的早期活动情况。	"	"	黑龙江編委	"			
30	一九二七～一九二八年抚顺党的活动情况。	1927·	唐韻超	抚顺編委	"			
31	一九二五～一九三一年党在大連活动及滿洲省委組織活动情况。	1925·	"	省編委	"			
32	一九二一～一九二六年哈尔滨革命运动和党的活动实际情况。	1921·	韓鉄声	"	"			

吳生白同志回忆一九二五年六月~~

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共沈阳党组织活动情况

~~ 訪問記錄 ~~

(按：吳生白同志，又名吳竹邨、松梅友，一九二五年秋入党，后于一九三一年冬与党失去关系。現任陝西省汉中市付市长。)

我于一九二五年时，在沈阳大南門里第四小学教书，据我知道一九二五年前，沈阳沒有党的組織，二五年上海发生“五卅”惨案后，全国各地都紛紛起来声援，当时在沈阳也与全国各地一样，掀起了一次規模浩大的声援“五卅”惨案的学生运动。在此之前，“五卅”运动以后，約在六、七月分，由北京党北方局派来沈阳一位任国楨同志，任到沈后先在青年会与青年会干事閻宝航等开办一个班，任在班里講課，講社会发展史，班中共有二、三十人，我当时也参加听課。当时国民党也派人发展国民党的組織，由日本东京回国的陈濤（当时名子是陈日新）他对社会的政治情况是很了解的，他对我說过任国楨講社会发展史是宣傳馬克思主义，我說管他什么主义呢！听一听。任国楨当时在大南門里文华閣南紙店住，講完課任就不到青年会去了，我們就常到他那去玩。那时，大家还辯論过民生主义，当时我感到很有兴趣。后来因那个地方不太方便，很危险，我家是一个独院，安全方便，我就让他搬到我家（沈阳南关通天街）来住。他一天工作很有秩序，上午出去，下午在家翻譯一个俄文材料（他是北大俄文系学生），他到外边作什么工作及看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。他常召集四、五个人在我家开会，他們一去我就离开。我是在这以前，由陈濤介紹参加的国民党，这以后不久，在九月分由任国楨及高子升介紹我参加共产党。樊曉天当时作团的工作，也是“五卅”后来的，他說他是上海同济大学学生，講“五卅”惨案的情况很生动感人，实际他並不是由上海来的，是那儿来的我不知道。后来他去哈尔

濱，二六年我去哈爾濱看到他是負責團的工作，當時哈爾濱黨的負責人是吳麗石。我入黨以後是搞民運工作的，專做國民黨工作，後來我去北京聯系工作及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，回來成立國民黨奉天省黨部，我擔任組織部長，當時五個常委有三個是共產黨員。那時在東北國、共兩黨雖然都是在地下活動，但有些國民黨黨員對於共產黨並不滿意甚至抱着敵視態度，在思想上的鬥爭很厲害，例如東三省民報胡若愚、北關中學學生孫百吉都很反對共產黨，胡給我寫信說共產黨不適合中國國情，要我注意周圍，孫給我寫信說我對赤色注意不夠，都是用密語寫的，胡寫信，國民黨代號K，共產黨代號C；孫寫信，用赤色公雞代替共產黨。

二五年任國楨到沈陽後成立了沈陽黨的小組，由任國楨負責，當時黨員共六、七人。任國楨於二五年十月離沈陽去吉林，不久被逮捕，二七年六月分出獄。聽說以後在太原犧牲的。在任國楨走後不久，沈陽黨組織經過運動中發展已有十多名黨員，已成立支部，由高子升暫時負責，時間很短（高子升原系滿洲銀行的行員，他是由任國楨介紹入黨的）。於二六年二、三月間，由哈爾濱來的楊韋堅（楊景洲）負責支部工作。我是一九二六年陰曆五月走的，以後的情況我就知道了。

當時，沈陽黨的小組和後來的支部是直接受北京北方局領導的，領導人是李大釗。在沈陽市內的其他單位都沒有黨的組織，只有個別黨員，如殖邊銀行的何松亭，志誠信銀行的巩天民，關銀姓郭的，師範學生周東郊，還有兩個學生（是那學校的，名字都記不得了），高子升也是滿洲銀行的行員。我當時在南門里第四小學教書。當時黨的任务就是發展黨的組織，培養黨員。曾想在瓦房店搞鐵路工人罷工，但因計劃被敵人發現沒收，我和高子升還險些被捕，而後就破產未搞。還領導了沈陽學生聲援“五卅”慘案的運動。除此，每星期還用半天時間學習唯物主義、馬克思及日本山川均、山川菊榮的著作等活動。

當時，在沈陽就是黨的小組和後來的黨支部，沒有什麼外圍組織。有

一个读书会，当时想利用，我去参加，看看里边的人物不行，多是胡适那套东西，就又退出来了。

继“五卅”惨案以后，在沈阳的学生中就普遍的酝酿着进行一次大的学生运动，即当时所谓“学潮”。各地都在宣传，大连也有人在沈阳宣传，讲台设在全省教育会，会长是师范校长馮志安，他不大过问这事，当时参加者以中小学教师、中学学生多些，虽然讲演者没去过上海，但讲起来还是有声有色，义愤填胸，说全国各地都动了，沈阳还没有反映……。当时，任国楨同志到沈时，此时运动正在酝酿中，吴晓天当时就以亲由上海来的身分进行宣传，影响很大。当时沈阳全部中学生和满铁医大学生都参加了这个运动。有北关中学（一中）、四中、坤光女师、汇文中学、商业中学、农林中学、男师、女师及满铁医科大学等，共约五千名学生左右。这是东北反动统治时期，空前绝后的一次大“学潮”、震动面很大，运动直接受党的领导，党的会议都作研究，当时，学生中选的总代表是栗丰（满铁医大学生，广西人），威信很高，能力很强，栗担任总代表后运动发展更为迅速。运动高潮阶段，是在七月（？）分的一天（阴天），早饭后，各校学生分头整队，手拿当时的国旗（红黄兰白黑）集合到金銀庫胡同督军署门口请愿，提出收回租界地、赔偿、道歉，取消“会审公廨”（在上海租界地司法公审机构）等要求。反动政府要学生派出代表，由栗丰代表全体学生进督军署提出请愿意见，而被反动政府扣留，因而学生在外边喊口号，要求放回代表，军警阻挠，抢夺学生的旗帜，学生立即提出抗议，高喊：“你们污辱国旗！你们不是中国人吗？……”军警不再动手了。而后教育厅长祁公亮出来对学生讲话，企图瓦解学生分裂学生，说，栗丰是个广西人，他爱国，为什么不在广西爱国，到沈阳来爱什么国！他是个赤色分子，图谋不轨，不要轻信他等等。学生们对他的讲话，报之以“全体哗然”也有喊“通”的。不在祁跟前什么也听不见。学生一致要求放回栗丰，不放栗丰决不回去。结果把栗丰放回。学生们才整队回校。这一天

反动政府出动了一个师的兵力，全城警察几乎全部出动，到处設崗、設防，但是沒有阻擋住學生們的愛國熱情，农林中學來的較晚，軍警阻攔不許進會場，但學生們英勇地一連突破幾道防線，當時受到路旁群眾拍手稱贊。我當時是以東三省民報記者身分到現場採訪消息的，看此情景，感到痛快。女師及女師附中是翻牆出來參加集會的，校長出來，把鞋都跑掉了，對學生們喊：“我的媽媽們哪！你們上那去！”傳為笑柄。這一運動的結果，在東北，特別是在教育界，影響很大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談話的中心。有很多老教員說，“青年人真了不得，膽子大，見義勇為，我們想動，也沒有這樣的勇氣。”這一次運動給人民以很大的鼓舞，也給反动政府一次有力的打擊。

運動後，栗丰給上級組織寫過報告，緊接着他就離開沈陽。東三省民報，還專為此次運動开辟了報導專頁。

據我知道，“五四”運動時期，在沈陽沒有什麼大的活動，只是在校內出些壁報，我當時在東關第一小學出過牆報，同時還在學生中講解“五四”運動的情況，着重講21條，使學生能知道當時軍閥政府的及其代理人曹、陸、章等的賣國投敵和投靠帝國主義的反動行徑。其他學校情況不詳細。

當時聽說蘇聯革命成功了，願意知道蘇聯的事，但看不到這方面的書籍，後來閻寶航從廣州丁卜圖書社買來一些進步書籍，這批書籍看的人很多，作用很大，起到了啟蒙作用。從這種事實也可以窺察出當時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況。

五四時期的政治情況，當時張作霖總的是傾向於日本，但在某些小的問題上還有矛盾。張作霖與日本掛鉤主要是通過楊雨亭，所以楊的勢力一天一天大起來，與少帥派互相抗衡。張作霖死後，張楊的鬥爭更為激烈，以後，楊派終為張派所消滅。

在經濟上，張作霖還想辦工業，開辦了紗廠，當時日本人想各種辦法限制他發展工業，直到我離開沈陽時，沈陽除紡紗、槍廠外，沒有其它工業。但日本人在鐵西辦了不少工廠，還造設鞍鋼、撫順煤礦、周水子機車廠，

当时主要經濟命脈都掌握在日本人的手里，甚至連小型的工厂都沒有自己办的。所以当时东北人民特別是青年对帝国主义、特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性是非常大的。

訪問整理人

朱永閣

李煥亭

1960年7月30日

同意这分記錄材料。

吳生白

1960年7月31日

吳生白同志回忆1925年~1926年

黨組織在沈阳的建立和初期活動情况

——訪問記錄——

(按：吳生白同志1925年秋在沈阳第四小学参加中国共产党。現任陝西省汉中市付市长。群众。)

1925年“五卅”运动发生后，沈阳的学生和青年，为了支援上海的“五卅”运动，举行了遊行示威。参加的人主要是滿铁医大学校的学生，学生代表是栗丰，还有个姓崔的。后来听说医大的斗争所以比較激烈，是由于他們那儿有个研究馬克思主义小組（估計可能有党的組織）。

1925年党从北京派任国禎、吳曉天到沈阳发展党团组织。从东京回来的陈日新发展国民党的組織。

任、吳到沈阳后，在青年会組織了一个学习班，学习社会科学，学习中經常开辯論会。記得有一次在文化閣曾辯論过孙中山的民主主义，即孙中山說的他是“生理学家”、“馬克思是病理学家”的問題。通过这次学习发展了几名党员，这是在1925年夏开学时。

任国禎到沈阳时，先住在文化閣，后来由于不方便就搬到我家去住，以后就有人經常到我家开会，后来我入党时，才知道經常到我家来开会的都是党员。我入党是晚一些，是在任国禎搬到我家后，任国禎向我談过入党問題，后来让我填了表。我入党时，党就是以支部名义出現的，小組可能是建立在1925年6、7月間。因为任国禎搬到我家时是在8月間，任到我家后就經常有几个人来开会，因此可确定在任国禎搬到我家前就已經有了党的組織。記得当时的党员有高子升、李耀奎（是社会学校的，比我入党早点）、刘平平（小东关住，家最有錢，其父是有名的刘大山，曾当过省議員）、巩天民、周东郊和苏子元（可能入党晚一点）。党的負責人是任国禎。到1925年的年底任国禎去任国禎去吉林，吳曉天去哈尔滨。这时党支部是由高子升暂时負責，后来从中央派来的楊世堅負責，他是由苏联回来的，住在日本站，我會經到那开

过会。1926年上半年党员多了些，在南满银行经常由高子升组织学习，参加有十多个人，差不多每星期都有学习会。

1925年6月1日，我曾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。回来后于1926年在奉天组织国民党省党部，记得巩天民也参加了。我是任组织部长，我的身份很秘密，国民党员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，国民党有个最反动的孙伯极和“民报”编辑于若愚都给我写过信，辩论过关于国共和作问题。因为我在国民党里身份很秘密，所以党给我的工作任务是民运工作，实际就是到国民党里边工作。主要任务是先发展国民党员，然后从中找好的，发展成为共产党员（当时国民党还是革命的），壮大革命力量，配合北伐。国民党在东三省办了个“民报”，宣传国民党的主张。

1925年以前在瓦房店有党的组织，在复县或瓦房店铁路的东山有个小学校里，党的机关就设在这个小学校里。瓦房店我们曾去过两次，有一次我与高子升去瓦房店到铁路工人中发展组织，早晨下车后，就被日警扣留在候车室里，后来乘日警离开候车室的时候，我们俩跑开了。路过那个小学校时，告诉他们把有关文件收拾起来，以防日警检查（因为在站被盘问时会说过到小学校里办事），并由机关派人把我们送到乡下胡同志（中共党员）家中。第二天有同志来说，学校被检查了，但什么也没发现。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，开过一次会，就从瓦房店以北的一个小站离开那里回到沈阳城南十里河。1926年夏我离开沈阳前是勾通了关系。后来一直到1952年我才回过一次沈阳。

1927年我在武汉时，东北来人叫我回去，船票都买了，纪又白、付××也同我一齐回东北，纪又白到大连后就被扑了。我准备第二批走，还没有出发，由于国共矛盾很大，党就把我派往国民党第30军去了。

我走以后第四小学教书的李××被吸收入党，后来听说这个人牺牲了，朱焕阶能知道这个姓李的叫什么名字。

任万国整理
付乃礼

1959年5月15日

~2~

郭尊三同志回忆党在沈阳的地下活动情况

——訪問記錄——

(按：郭尊三同志1928~1930年負責傳遞党的活动經費和信件工作。1930年脫党，1953年重新入党。1958年在中国人民銀行沈阳分行退休。)

我是1924年入党(但苏子元說我是1925年入党)，介紹人是高子升和苏子元二人。当时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。入党后我作互济会工作(互济会是党内同志的，主要是救济在獄中的同志及其家屬)，并負責傳遞信件和經費工作。在1928年或1929年时，曾由上海汇来过800元党的活动經費，經我手交給当时沈阳党的負責人丁某(可能是丁君羊，材料整理人註)。我入党时，組織名称叫“奉天支部”，归哈尔滨領導，負責人姓韓，是湖南人，韓的爱人也是南方口音。当时支部曾在“四成天”錢舖开过支部会，也在渾河大堤开过会。會議內容主要是討論国内外形势。梅山客这个人作报告的次数比較多。另外，曾在东关区水渡箕胡同租过一間房，作为活动据点，当时有个朝鮮人叫李成林就住在那，后来該人叛变了。另在1929年間，在北关霸王寺附近租一間房作为党的活动据点，有时在这开党的會議。当时有个姓刘的(大高个，后来据郭任民講就是刘少奇同志)曾到那开过会。刘講：“中国不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……。”参加这次會議的有我和郭任民、何松亭、高子升等十几个人。这次开会的时间約一小時左右。

我入党以后，和我在一个党小組的有高子升、何松亭、李郁阶、李增玉、郭任民、宋小波等。由高子升負責。当时的活动不多，只貼几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标語。

沈阳什么时候开始有党的組織，我不清楚。1922年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当庶务干事时，在青年会內曾組織补习班，主要講馬克思理論。第一期参

加的人有巩天民、苏子元、高子升、张景珍（女）、陈某（女）、侯某（女）等人。

1924年左右任国禎来沈，負責党的書記。1926年任国禎离沈去山东。吳丽石、吳曉天、楊韋堅都負責过党的書記工作。王立功（木匠出身）負責过党的支部委員責任。

1930年秋，党在郊外召开扩大会议，据说有叛徒告密被破坏，丁某等人被扑，一年左右出獄。

“五卅”运动时，在沈阳有过示威遊行，还不只一次，我們也貼过标语。

“关外”杂志是党的文艺刊物，是三十二开本，鉛印的小册子，由宋小波、苏子元等人主持的。这个刊物大概是在1927年以后出版的。

“反帝大同盟”是党的外围組織，在1927年以后成立的。

“救国十人团”也是党的外围組織，大概是在1928年或1929年間成立的。十人为一组，主要宣傳中国人民在外交上受欺侮等。

1945年“九三”胜利后，八路军进沈阳时，我在沈阳志成銀行工作。丁宜同志到志成銀行找巩天民，由巩天民介紹認識了丁宜，当时还有余渭（現任沈阳农学院总务处长）。丁宜同志曾对我說：“到千革命的时候了”。后来党拿錢准备開設一个“辽宁书店”，丁宜作股东，我作經理，后来沒有搞成。我在这时又由张为先、丁宜介紹重新入党。1947年党派王慎（又名紀博）由哈尔滨来沈阳搞地下工作，走到鉄岭被扑，后叛变，供出巩天民、张为先和我等十余人，把我們全部扑去，至1948年10月30日沈阳解放前夕才被释放。张为先被扑后，曾在獄中叛变。

关亚軍
任万国 整理

1960年2月26日

佟玉华同志回忆1925年

党在沈阳市的活动情况

——訪問记录——

(按：佟玉华同志1926年春在沈阳第二工科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。现在沈阳市房产局工作。群众。)

我去基督教青年会补习英文时，是1925年，后来在那年暑假成立了学习班：有数学、文学、常识和社会科学班等。当时有一个干事苏子元很进步，让我参加社会科学班。讲授的人是由上海来的吴震（吴晓天）给讲社会发展史并介绍一些杂志。有“响导周报”、“实践”、“新青年”和介绍一些有关国际方面的材料。吴震走后，又来一个叫杨革坚的。杨革坚有时住在我家（大南关药王庙胡同）。

高鉄生是满洲银行会计，有时在他那开会，搞一些宣传。高鉄生主要是在工人和职员中活动。当时还出了一种刊物“奉天青年”主编是苏子元，内容是宣传“响导周报”、“新青年”等，共出版了四期，后因经济发生困难停办了。哈尔滨方面曾经寄到我家里一些文件和款子。

我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。

1925年建立了沈阳市学生联合会，开会地点是小河沿医大。当时学联主席是毕天民。参加学联的学生有文会中学、三中、一中、女中、一师等。主要是各校学生搞反帝爱国活动。当“五卅”惨案消息从上海传到沈阳时，沈阳各校学生和老师都起来反抗，并募捐奉票两万五千多元寄到上海去。学生罢课、游行，并到英、日领事馆门前呼喊口号“打倒英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等。后来又募捐两万多元，因上海总工会被封，未寄给上海。

陈国英

楊淑娥

整理

1959年2月16日

王純一同志回忆1925年~1930年

党在沈阳等地区的活动情况

——訪問記錄——

(按：王純一同志1925年12月在沈阳一师参加中国共产党，27年去台安黄沙坨任党支部书记。现在沈阳第十二中学工作。群众。)

上海“五卅”惨案时，我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，那年毕业。当时党组织在沈阳发动了青年学生为援助上海学生，在6月10日那天组织了学生游行示威、请愿和散发了很多传单。参加的学校有医大、一中、三中、一师、第一工科、教会学校等共两三千人之多，这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。并成立了奉天学生统一组织——“奉天学生联合会”。学生会代表是高启福、毕天民。通过这次示威游行，弄得当时的军阀不知所措慌忙令各校放暑假。

我于1925年暑假入党后，就转到哈尔滨特区地方党委。“哈尔滨国防协报”有我们一部分同志，铁路工人里有我们党组织。我们办了贫民夜校（主要是工人等学习），我们的同志做教员在里进行宣传。“哈尔滨报”也是党所掌握着的，内里有韩道炎、刘丽石、高崑光等。

1926年5、6月间，苏子元被派到綏芬河国境工作，主要是护送去苏联的学生，还组织了一部分工人掌握了铁路工人工会。

1927年我回台安县，即在黄沙坨建立支部，当时由我领导。活动据点在台安黄沙坨小学校里我任校长。1928年李维周、孙广厚二同志又来台安。在该地小学教员和师范学校学生中吸收了一些积极分子，扩大了党团组织，共发展团员三十多人，还出过一种油印刊物。当时有黄吟秋、吴玉书、何养天（李义子）、李维新等，吴玉书解放后还开印刷厂。

1930年我离开台安之后，据说又组织了反帝同盟和学生罷課等活动。1931年至1932年情况，因我回到沈阳就不了解了。

我到奉天后，在沈海铁路公司当职员，当时只知道台安、辽中、撫順、柳河县